

# “资源诅咒”命题及其制度传导机理研究

芦思姮

(中国社会科学院 拉丁美洲研究所,北京 100007)

摘要:自“资源诅咒”命题提出以来,经济学家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了在跨国层面上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负相关性。针对这一命题传导路径的研究成果进行有重点的整理与解读,旨在阐释文中存在“资源租”和“资源租金”两种表述,是否需要统一?如何通过四个“挤出”,对政府、企业及个人行为产生非绩效的激励与约束;在此基础上,侧重于从制度弱化维度深化对该命题形成机制的认知,探讨在欠发达国家中,制度因素如何在各经济行为体之间调整成本收益比,使其做出导致资源错配的选择,进而对经济绩效产生负向影响。

关键词:资源诅咒 “挤出”;激励;制度约束;经济绩效

中图分类号:F014.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7)8-0082-06

早在18世纪末,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其《人口原理》中,就强调了资源对于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意义,并基于人口学视角对土地资源的报酬递减规律表示担忧。<sup>[1]</sup>20世纪中期以来,经济学家逐渐意识到资源丰裕型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甚至陷入长期停滞或衰退的事实;此外,资源富集国家在经济绩效层面上被资源贫乏国家赶超的现实。通过大量跨国层面的实证研究,经济学家验证了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负向相关性。这种自然资源优势所产生的增长悖论被英国经济学家Auty命名为“资源诅咒”。<sup>[2]</sup>

对这一命题的学术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资源诅咒”的存在性及其形成机制。对于前者,在大量检验这一假说存在性的经验性研究中,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是Sachs和Warner的系列学术成果。<sup>①</sup>二人构建S-W框架,以人均GDP增长率作为因变量,以初级产品出口在GDP占比作为自变量,资源丰裕度的代理变量,逐步加入控制变量,测算了作为样本的95个发展中国家长达21年的经济发展情况,最终验证了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之间呈现显著负相关性。以这一分析框架为基础,“资源诅咒”假说在跨国层面上的

适用性得到学术界的广泛支持。近年来,在一国区域层面上验证是否存在“资源诅咒”假说的文献也不断涌现。以我国为例,经济学家徐康宁和韩建通过理论推导和面板回归分析,检验了我国省际层面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的负相关性,并且重点突出了人力资本投入对这一现象的制约作用。<sup>[3]</sup>

本文侧重于对“资源诅咒”命题传导路径进行梳理与思考,尤其强调在资源富集的发展中国家中,制度渠道对政府、企业、个人行为形成的激励扭曲,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源浪费与错配对经济绩效造成的恶果。

## 一、“资源诅咒”传导渠道的四个维度

(一)对资本形成的“挤出”:价格机制对降低投资和储蓄行为的激励

价格是最主要也是最直接的激励机制,其变动会促使经济行为主体对收益与机会成本进行重新调整与比较。我们知道,资本形成的主要路径在于加大投资和储蓄两方面。然而,Gylfason和Zoega提出资源型产品的价格特征对提高投资和储蓄率产生相斥的作用力。<sup>[4]</sup>

20世纪中叶以来,以普雷维什为代表的拉美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第一批“中拉关系及对拉战略研究”(ZDA067))

作者简介:芦思姮(1987—),女,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制度经济学、区域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

① 参见Jeffrey D. Sachs and Andrew M. Warner二人1995年、1997年、1999年和2001年系列论文研究成果。

结构学派提出“中心—外围”思想,该理论的核心概念是贸易条件的长期恶化论。Prebisch 和 Singer 都认为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存在长期恶化的趋势特征,这既是因为初级产品面临不利的需求条件,也是由于在中心—外围体系中,经济周期的波动对两级的影响程度不同。<sup>[5]</sup>具体来说,繁荣周期阶段,初级产品和制成品价格均会上涨,且前者有时价格提升的幅度要高于后者;经济下行期间,由于初级产品生产者之间竞争激烈,而制成品厂商的垄断力量强大,因此,初级产品下跌程度始终要比制成品强烈。周而复始,初级产品价格波动幅度大于制成品,初级产品和制成品之间价格差距逐步拉大。

经济学家通过不同路径验证了资源型产品价格对有效投资和储蓄行为形成的“挤出”效应。其一,发展主义经济理论告诉我们,如果根据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资源丰裕型国家应致力于初级产品专业化生产,进而降低对加速工业化的投入,那么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长期恶化将导致该国陷入贫困化困境。其二, Mikesell 认为,资源型产品价格的周期波动性较强,这对一国财政收入和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的稳定性造成冲击,而收入的波动亦会使家庭缺乏对投资和储蓄的激励。<sup>[6]</sup>此外, Papyrakis 和 Gerlagh 也指出初级产品的价格波动性或导致本国和外国投资者对投资回报率产生负面预期,从而形成资源部门投资不足的局面。<sup>[7] [15]</sup>其三,也有学者从公共部门对资源财富支配方式的层面作为切入点进行分析,如 Atkinson 和 Hamilton 提出经济周期利好时,资源产品进入“超级周期”,政府短时间内由于资源价格的上涨获得了丰厚的经济租金,对其支配有两种方式,一是当期消费,二是形成储蓄或者投资。<sup>[8]</sup>鉴于资源部门的繁荣和可获性优势,自然资源丰裕型国家的公共部门往往盲目自信,对未来收益产生过于乐观的预期,基于此,政府部门缺乏通过鼓励储蓄或形成有效投资为国家长期发展创造更多财富的激励。

## (二) 对制造业的“挤出”: 对生产要素部门间转移的激励

这一概念以荷兰资源经济发展的教训为基础,通称“荷兰病”,主要指因新资源的发现促进资源部门的繁荣,却造成其他生产部门萎缩的去工业化现象。“荷兰病”的经典模型是由 Corden 和 Neary 所构建的。<sup>[9]</sup>两位学者将一国的经济分为三个部门: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可贸易的资

源出口部门,以及不可贸易的部门。该模型假设该国经济发展初期处于充分就业状态,试图阐释因新资源被发现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而产生的一国资源部门的蓬勃发展对该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尤其是对制造业发展的消极作用。

总体而言,国外学者分别从汇率效应、“挤出”效应和支出效应三条路径对这一问题形成的作用机理进行了解释:其一,初级产品出口扩张导致外汇供给增加,从而使实际汇率提升,但与此同时,这一趋势却打击了本国制造业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其二,资源经济的蓬勃发展产生的大量利润在短期内远高于传统制造业部门,受生产要素的逐利性所影响,无论是劳动力还是资本要素的流向都会发生转移,投向资本回报率更高的资源型产业。这种要素流向的改变使制造业不得不支付更多的代价去吸引投资和劳动力,这导致制造业发展所必需的要素成本上升,进而对该部门形成“挤出”。其三,对于“支出”效应,自然资源出口带来的可观收益会使国内增加对制造业和不可贸易部门产品的需求。一方面,由于本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下降,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扩张主要是由进口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外同类制成品实现的,但大量进口商品的涌入对本国制造业产品会形成进一步的打击;另一方面,鉴于对非贸易产品的需求增加不能通过贸易来满足,在这种情况下,本国非贸易部门,主要是服务业将获得较快的发展。我国学者龚秀国和邓菊秋通过实证分析,以上述三个“效应”为渠道,探讨了“荷兰病”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尤其是对西部大开发产生的不利影响。<sup>[10]</sup>

## (三) 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挤出”: 对降低创新和教育投入行为的激励

人力资本理论和内生增长模型均强调教育的作用,认为对这一要素投入的差异是各国长期以来产生不同生产率的重要原因。教育作为一项投资品,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

然而,经济学家发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之间的正向溢出却无法体现在严重依赖资源发展的经济体中:这类国家往往缺乏对人力资本积累的积极性,进而长期陷入经济低效困境。这一问题的产生主要基于两条渠道。

一方面,资源部门和以资源为基础的工业部门普遍对劳动技能要求较低,而制造业则以规模经济以及技术溢出著称,因此资源开发繁荣对制

制造业部门劳动力的转移会导致更多人为追求高利润脱离以“干中学”为特征的制造业部门,将自己锁定在低技术水平的资源产业上。在蓬勃发展的资源型部门内,技术更替周期长,且创新活动并不频繁,与此同时,对知识溢出具有正外部性的制造业逐渐萎缩,这些趋势特征会减少社会经济对创新与技术进步的需求,进而政府层面对旨在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政策激励也会随需求的下降而减少,这不仅对正在进行或潜在的技术研发活动形成抑制,更会降低经济体系整体运行的平均绩效水平。

另一方面,现期巨额的资源财富使政府和社会对本国经济发展前景形成过度乐观的预期,从而缺乏对教育投入的激励。随着人力资本逐步积累,在其他政策给定的前提下,社会不平等性将得以改善,经济绩效得到提升,而这些利好因素又反过来促进对受教育的需求,推动入学率的上涨。然而,这种良性循环却在资源富集型国家被打破。这是因为政府的发展战略不再强调人才与竞争力的重要性,这将降低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从而导致穷人轻视作为消费品的教育的效用,在这种情况下,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传导链条断裂。

(四)对高效制度的“挤出”:对制度弱化行为的激励

第四个维度的影响路径是本文下一部分重点讨论的内容。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制度在解释资源诅咒型国家经济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绩效的长期背离问题时,具有更强的说服力。第三部分,我们将探究在具有资源禀赋优势却落入增长陷阱的发展中国家中,制度与资源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这种关系对政府、企业、社会行为产生的激励与约束。

## 二、制度视域下“资源诅咒”的形成

近二十多年来,新制度经济学派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力逐步扩散,制度要素在经济绩效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该学派代表人物 North 肯定了社会中制度的根本性作用,强调这一要素在经济发展,尤其是长期经济绩效中的决定性因素,他将第三世界国家贫穷现状归因于制度约束限制了政治或经济活动的收益,而这一收益非但没有对生产性活动形成激励,反而背向而行。<sup>[11]</sup>

不少政治经济学家试图用制度变量解释资源诅咒,认为自然资源本身并不会阻碍经济的长

期增长,“诅咒”的产生更多的是基于制度的因素。值得强调的是,Meihlum 等人在 S-W 研究框架的基础上,对 87 个国家数据样本进行分析,得出“资源诅咒”仅作用于制度不合理的国家,制度指标中存在一个门槛值,当高于某一数值,丰裕的资源将对经济发挥正向作用。制度是决定一国是否能够摆脱“资源诅咒”的决定性因素。<sup>[12]</sup>

我国学者张景华认为自然资源对于经济发展究竟是“福音”还是“诅咒”主要取决于制度质量的差异。他通过理论模型,指出向强者倾斜的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弱化,将保护既得利益,易于使稀缺性的企业家才能脱离生产领域,转移到非生产性活动中,从而产生“增长陷阱”;只有向生产者倾斜的制度才是有效的,可以保护创新,保障法制与契约的执行,从而吸引企业家才能投入到生产活动中来,带来较高的增长。<sup>[13]</sup>此外,也有学者如王必达和王春晖,从交易成本的维度,通过构建一个两区域模型,论证资源丰裕地区在发展初期为了规避高昂的交易费用而选择倚重资源禀赋的做法是完全经济的、理性的,但往往在资源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的设计并未与时俱进,未能对人力资本的积累与投入、新技术的研发,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实行正确及时的引导,从而导致经济绩效因制度刚性而深陷“资源诅咒”。<sup>[14]</sup>

Vardy 认为一国经济多元化、复杂性程度越高,制度的边际收益越大。<sup>[15]</sup>也就是说,一国经济的增长需要高效健全的制度作为支撑,高质量的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另一方面,低质量的制度会导致一国更倾向于输出初级产品与低技能劳务,从而使其始终处于价值链的底端。总体来讲,在资源丰裕型国家中,“资源诅咒”形成的制度渠道主要包括两个维度: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这两条制度弱化路径既独立发挥作用,又相互作用,互有交叉。

(一)经济维度:对贸易保护和资源垄断的激励扭曲

从经济制度层面来看,主要作用路径有对外开放度和产权制度两方面。

其一,关于贸易开放度。不少经济学家在跨国层面经验性研究的基础上,指出资源富集型国家倾向于采取内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通过提高关税或减少进口配额等措施降低对外开放水平,以维护本国所拥有的自然资源优势,从而保障政府对巨额资源财富的收益权。然而,长期来看,

这种政府干预下的贸易保护制度会造成激励扭曲:一是会使经济结构逐步单一化,形成整个国民经济对资源部门的过度依赖;二是在高保护政策激励下,市场竞争机制无法发挥作用,企业失去技术革新动力,从而使经济秩序陷入恶性循环。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后果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的拉丁美洲各国体现得最为显著。

其二,关于产权制度。这是一个对资源产权划分的问题。Guriev 等人认为当一国公共制度质量和人力资本均处于较低水平时,资源更有可能被国有化管理。<sup>[16]</sup>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资源管理模式容易使国家公共部门过于轻易地获得丰厚的资源租,安享暂时的繁荣,这会导致政府倾向于以更加短浅的视角看待国家的长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一国经济会对少数几种资源产生高度的依赖性,而且公共部门将缺乏制定和实施对长期发展有益的经济多元化措施的动力。在资源垄断背景下,政府对资源租的管理和使用是产生“资源诅咒”的一种解释。国家在支配大量涌入的资源租时面临当期消费或储蓄和投资二选一。对于资源丰富的经济体来说,资源租的强可获性使国家更加偏好提高现阶段的政府支出,而缺乏在当期提供公共物品或在长期促进有效资本形成的激励。

可以认为,国家利用政府的力量建立了致力于资源管理的大型国有企业,并借助这一机制特殊的市场地位垄断了本国大部分自然资源,这可能会带来低效率的资源配置。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国有化并不能切实划分资源部门的产权问题,尤其对于法制体系和行政制度缺失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往往会导致在产权界定上无法可依或是有法不依。<sup>[17]</sup>对制造业来说,产权的不确定性很大程度可能成为其发展的制约性因素,因为恶性的营商环境会使许多投资者望而却步,但这一问题却并不妨碍资源产业的发展,这主要是基于短期高昂的资源回报率使投资者甘冒风险。对企业而言,当获取可观资源租的逐利行为面对产权实施存在合法性障碍或操作技术性困难时,大规模的非生产性活动,如寻租和腐败行为便不可避免。

自此,我们看出,这一问题从经济层面上升到了政治维度,变得更加复杂。不难想象,自然资源所有权收归国有,国家对资源的经营、行政管辖及收益分配进行统一的规定与调控。资源收益权过于集中在少数官僚机构手中,在相关产

权规制及其配套措施缺失的情况下,大量资源财富涌入,会致使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政府部门产生罔顾相关合同法规的行为激励。

(二) 政治维度:对非生产性活动和资源错配的激励扭曲

从政治层面来讲,制度弱化的路径主要包括寻租和腐败行为,以及权力斗争两个层面。

其一,寻租与腐败。公共部门在开采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能够获得可观的经济租金,这会对企业等社会集团支付代价进行逐利活动产生强烈的激励。在制度体系不健全的环境中,攫取这一丰厚收益的“捷径”便是向政府官僚机构寻租和行贿。无论是哪一种行为都会导致要素的非生产性使用。

首先来看寻租活动,一国既有制度不健全会滋生寻租的土壤。政治和法律制度质量低下会助推强大利益集团之间产生“贪婪效应”,从而加剧这些群体对资源租金收益分配的竞争与冲突。此外,制度质量的优劣也会对寻租活动和生产活动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劣质的制度安排会导致寻租成为正常社会生产活动的阻碍。在监管体制不完善的条件下,生产者的寻租行为降低了经济绩效。

再来看腐败行为,早期曾有经济学家将政府腐败和官僚化视为寻租活动弱化政治制度质量的传导渠道。<sup>[18]</sup>根据 Gylfason 的研究,自然资源资本在国民财富份额提高 15 个百分点,透明国际的腐败指数将下降 2 个点。<sup>[19]</sup>我国学者彭爽和张晓东从腐败视角探讨“资源诅咒”命题的传导机制,二人基于中国省级层面跨度 11 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资源禀赋与腐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从而指出自然资源能够通过引致腐败,弱化地方政府治理质量,制约资源富集地区的经济发展。<sup>[20]</sup>总体而言,自然资源丰裕度会对公共部门的腐败行为产生激励,进而导致政府制度运行的低效,甚至无效性。

其二,权力斗争。伴随资源租出现的不仅有腐败和寻租行为,鉴于资源租金的强可获性,及其对稳固执政地位的保障作用,这一巨额利润还会诱使不同政治经济利益集团对资源控制权的争夺。在这一斗争进程中,国家权力会进一步集中到少数精英手中,从而不利于社会民主进程的良性发展;此外,巨额资源租的存在大大提高了获得执政地位的收益,因此改变了统治者和潜在政权挑战者的行为激励与约束,尤其对于前者而

言,政治领导者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应对潜在挑战者对攫取资源租的行为,更有动机致力于将巨额利润投向眼前激烈的政权争夺斗争中,从而忽视对国家长期发展有益的要素投入,诸如鼓励创新、提高政府效率和透明度、优化产业结构、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市场开放度等。值得注意的是,利益集团的权力冲突会对政府、企业和个人产生错误的行为激励,从而有损于相关产权保护制度的合理合法实施,在既有制度不完备的国家和地区更是如此。<sup>[21]</sup>

### 三、对“资源诅咒”及其制度困境的启示 与思考——以拉丁美洲为例

毋庸置疑,拉美地区是世界范围内资源诅咒问题最为典型的区域。一方面,作为全球资源禀赋最为出众的地区之一,丰裕的能源矿产曾是区域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支持。但另一方面,在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沿革中,这些国家却不同程度地落入了“增长陷阱”。基于此,拉美地区一直是国际学术界研究“资源诅咒”命题的重要案例,尤其是墨西哥、委内瑞拉、智利、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国。

Sachs & Warner 对拉美七国资源禀赋与经济实绩之间负相关性进行了实证检验。2001年,二人在模型中加入了制度安排、地理因素和价格波动等因素后,仍然验证了资源富集与经济发展之间显著的负向联系。

对于拉美地区“资源诅咒”的制度传导,根据2010年世界银行针对这一地区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自然资源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往往非但不需要高质量的制度作为基本要素,恰恰是运行水平低下的制度,尤其是非法制环境会使这种资源经济获得生长的土壤。<sup>[22]</sup>这一关系的传导主要是因为制度的缺失有助于自然资源在不受限制的宽松条件下进行开采。不可否认,在这一前提下,采掘活动的成本相对较低,且自然资源的边际产出比在成熟健全制度下要高。可以认为,资源开发部门对提高制度质量具有向下的拉力,因此,制度的改革创新在这一部门往往因缺乏激励而发展滞后。

从国别角度出发,这里以拉美地区“资源诅咒”现象最为典型的委内瑞拉为例。该国拥有当今世界最大的石油储量,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据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统计,2015年,委内瑞拉以2980亿桶居世界已探明的

石油储量首位。

在近半个多世纪历史沿革中,委内瑞拉经济陷入了“增长陷阱”。增长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与发达国家人均GDP差距日益扩大,而且被资源匮乏的东亚多国赶超;此外,增长的波动性、脆弱性加剧,危机频发。在查韦斯当政期间,石油资源收归国有,再加上国际石油价格的攀升,委内瑞拉依靠石油出口赚取了大量外汇。委内瑞拉面临一个改善单一经济结构,摆脱增长“陷阱”,以丰厚资源收益支持本国可持续发展的绝佳机遇。

然而,与许多“资源诅咒”国家如出一辙,查韦斯政府一方面执着于在权力斗争中稳固地位,另一方面,将绝大部分资源都投入到非生产性的社会领域。委内瑞拉完全依赖于石油收益去维持与自身经济发展阶段,以及与政府财政能力不相符的福利水平,甚至不惜削减有利于长远发展利益的生产性公共支出,如加大基础设施投入,促进经济多元化发展等。

在有利的国际市场环境条件下,以石油贸易盈余推动尚可以维系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但由于经济运行严重依赖石油资源,委政府无法对石油下行周期进行预期,并做出合理反应。正如近两年来所发生的那样,一旦油价下跌,委内瑞拉国内价格信号失灵,对外部门出口收入锐减,政府的财政空间受到刚性社会性开支的严重挤压,从而导致社会经济陷入严重困境。

制度传导机制方面,在该国的政治经济生态中,寻租活动对资源分配机制的扭曲产生了重要的激励作用。一方面,政府需要足够的财政收入去巩固执政地位,因此成立了委内瑞拉国有石油公司,采取国有化措施将自然资源集中管理,以维持对资源财富的垄断。巨额的石油收入使其掌管者——政府拥有了强大的权力。

另一方面,在委内瑞拉这样的石油出口国,丰厚的石油租吸引众多利益集团耗费过多的资金、精力和时间从事低效的非生产性活动,以期作为国家资源的潜在受益者,从政府部门获取更多的资源利润,这不仅使石油收入成为腐蚀公共部门的温床,而且对企业正常的生产性活动形成“挤出”,从而影响国家长期生产能力的提升。

国家作为资源的所有者,不得不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寻求合理的资源租金分配方式,但由于政府在财政管理制度与配置方面能力薄弱,因此,更加倾向于放任寻租行为,放弃公共管理与

分配职能,沦为在公共领域抽取资源租金的机器。

### [参考文献]

- [1] Thomas R. Malthus.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M]. London: J. Johnson, 1993.
- [2] Richard M. Auty. Sustaining Development in Mineral Economies: The Resource Curse Thesis [M]. London: Routledge, 1993.
- [3] 徐康宁 韩建. 中国区域经济的“资源诅咒”效应: 地区差距的另一种解释[J]. 经济学家 2005 (6).
- [4] Thorvaldur Gylfason and Gylfi Zoega. Natural Resource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Role of Investment[R]. EPRU ISSN0908 – 7745, 2001.
- [5] Hans W. Singer. The Distribution of Gains between Investing and Borrowing Countrie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 1950 (40).
- [6] Raymond F. Mikesell. Explaining the Resource Curs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Mineral – exporting Countries [J]. Resources Policy, 1997, 23(4).
- [7] Elissaios Papyrakis and Reyer Gerlagh.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7 (4).
- [8] Giles Atkinson and Kirk Hamilton. Savings, Growth and the Resource Curse Hypothesis [J]. World Development, 2003, 31 (11).
- [9] Warner M. Corden and J. Peter Neary. Booming Sector and Deindustrialization in a Small Open Economy [J]. Economic Journal, 1982, 92(368).
- [10] 龚秀国, 邓菊秋. 中国式“荷兰病”与中国城乡就业研究 [J]. 国际贸易问题研究 2009 30(11).
- [11] Douglas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12] Halvor Mehlum, Karl Moene and Ragnar Torvik. Institutions and the Resource Curse [R]. Working Pape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Oslo, Oslo, 2002.
- [13] 张景华. 自然资源是“福音”还是“诅咒”: 基于制度的分析 [J]. 上海经济研究 2008 (1).
- [14] 王必达, 王春晖. “资源诅咒”: 制度视域的解析 [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5).
- [15] Felix Vardy. The Increasing Marginal Returns of Better Institutions [R]. World Bank, 2010.
- [16] Sergei Guriev, Anton Kolotilin and Konstantin Sonin. High oil prices and the return of resource nationalism [R]. Vox, 2008.
- [17] Richard M. Auty (ed.).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18] Anne O. Krueg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nt – seeking society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4, 64(2).
- [19] Thorvaldur Gylfason. Lessons from the Dutch Disease: Causes, Treatment, and Cures [R]. Institute of Economic Studies Working Paper W01, 2001.
- [20] 彭爽 张晓东. “资源诅咒”传导机制: 腐败与地方政府治理 [J]. 经济评论 2015 (5).
- [21] Roland Hodler. The Curse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Fractionalized Countries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5 (23).
- [22] Emily Sinnott, John Nash and Augusto de la Torre. Los Recursos Naturales en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más allá de bonanzas y crisis? [R]. Banco Mundial, 2010.

## Resource, Incentive, Institution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Review and Inspiration from “Resource Curse” and Its Institutional Transmission Mechanism

LV Si – heng

( Institute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7,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proposal of the “resource curse”, economists have proved, with a large number of empirical studies, negative relevant relations between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a transnational level. This paper is devoted to sorting out and interpret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about transmission paths of this proposition, in order to explain how the resource rents generate inefficient incentives and restraints for governments, enterprise and individual behavior through four “crowding out”. On this basis, by focusing on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position formation mechanisms from the institutional weakening dimension, it explores how institutional factors adjust cost – income ratio among economic actors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so that they make the choice that leads to the mis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then produces a negative impact on economic performance.

**Key words:** resource curse “crowding out”; incentive;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economic performance

(责任编辑: 黎 玫)